

# 評五四、文革與 傳統文化的論爭

● 嚴家炎

當前對「五四」的重新評估，可能導源於美國學者林毓生教授。他的著作《中國意識的危機》在國際漢學界頗有影響，80年代中期翻譯成中文後，在中國一些青年學者中間也引起反響。90年代，北京大學哲學系陳來教授響應林教授的著作，曾撰寫了一篇文章為〈二十世紀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的文章，在北京的《東方》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他們兩位都是我尊敬的學者和朋友，但在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具體問題上，我們之間的看法很不一樣。大體上說，他們的觀點很激烈，把「五四」和「文革」相提並論，認為「五四」是全盤反傳統的，而徹底的反傳統則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裂，帶來了中國意識的危機，影響所及，才会有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用林教授的話來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又重新出現『五四』時代盛極一時的『文化革命』的口號，而且發展成非常激烈的1966-1976年間的『文化大革命』，這決非偶然。這兩次文化革命的特點，都是要對傳統觀念和傳統價值採取嫉惡如仇、全盤否定的立場。」<sup>①</sup>林先生認為：「二十世紀中

國思想史的最顯著特徵之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堅決地全盤否定的態度的出現與持續。」<sup>②</sup>而首開風氣的是「五四」。陳來先生雖對新文化運動的功績有所肯定，卻也認為：「主導『五四』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與文化的激進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其表現為以『打倒孔家店』為口號的全盤否定儒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激烈態度。」<sup>③</sup>他從「五四」聯繫到「文革」，還一直聯繫到新時期以來重新提倡啟蒙、理性等等的「文化熱」，聯繫到《河殤》，把這些都看成是同一股思潮的產物，總的就叫激進主義。

只要不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稱做「過激主義」，我認為將之歸入激進主義一脈並不是不可以的，因為同學衡派的保守主義相比，「五四」的主潮當然是激進的。但問題在於像「五四」這樣一場文化運動，能不能叫做「全盤反傳統」？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我在1989年寫過一篇文章，主要從文學這個角度對「五四」進行反思，實際上是跟林毓生先生商榷的。現在我想將之擴展開來，就整個文化問題談談我對這類見解的看法。

林毓生教授和中國一些青年學者的觀點很激烈，他們把「五四」和「文革」相提並論，認為「五四」徹底的反傳統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裂，帶來了中國意識的危機，影響所及，才会有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 「五四」文化運動真是「全盤反傳統」嗎？

我覺得，「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自己的問題，但是不能把這場運動的性質判定為「全盤反傳統」。林毓生先生的一個大前提恐怕靠不住：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權」，造成了「傳統文化道德秩序崩潰」④，「五四」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起來，利用這個空隙來「全盤反傳統」的。這就把事情講反了。辛亥革命是推翻了清朝皇帝，但並沒有認真破除君權觀念、綱常名教和封建道德，「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一套還在人們頭腦中深深紮根。辛亥革命之前民主共和的輿論準備很不夠，當時主要是動員漢族起來反對滿族貴族的統治，革命內容主要是反滿，傳統文化道德秩序並沒有崩潰，並沒有解體。如果真的崩潰了、解體了，如果君主專制真的已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那麼還會有1916年袁世凱的稱帝嗎？還會有1917年張勳的擁戴溥儀復辟嗎？高一涵在「五四」當時就說：辛亥革命「是以種族思想爭來的，不是以共和思想爭來的；所以皇帝雖退位，而人人腦中的皇帝尚未退位」⑤，這個看法是符合實際的。辛亥革命吃虧的地方，就是不像法國大革命之前有一個啟蒙運動，以致革命之後，封建思想、帝制思想還普遍存在於人們頭腦裏，認為沒有皇帝不行。舉個簡單的例子：連楊度這樣一位曾經幫助過孫中山、堅決擁護改革的人，在1915至1916年間竟然也提出「共和不適用於中國」，給袁世凱上表「勸進」，勸袁當皇帝。所以，林毓生先生所謂「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權」造成「傳統文化道德

辛亥革命吃虧的地方，就是不像法國大革命之前有一個啟蒙運動，以致革命之後，封建思想、帝制思想還普遍存在於人們頭腦裏，認為沒有皇帝不行。所以，林毓生先生所謂「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權」造成「傳統文化道德秩序崩潰」這個大前提就搞錯了，他沒有顧及到許多事實，只是出於想當然。

秩序崩潰」這個大前提就搞錯了，他沒有顧及許多事實，只是出於想當然。

弄清了這個大前提，我們才能正確理解「五四」。可以說，正是由於袁世凱和張勳接二連三的復辟，以及像康有為這樣維新運動中的激進人物都主張要把孔教奉為國教，列入憲法，都擁護帝制，才引起了新一代知識份子的憂慮和深思。「五四」先驅者們覺得，中世紀的封建文化思想還深深地統治着人們的頭腦，所以需要一場新文化運動以及文學革命。陳獨秀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一文中說得明白⑥：

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在這樣一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它實際上從思想戰線的角度為辛亥革命補上了缺少的一課。

在帝制擁護者抬出「孔教」為護身符的情況下，《新青年》編輯部為了捍衛共和國體，不得不圍繞現代人怎樣對待孔子和儒家的問題展開了一場爭論。1917年初，在陳獨秀發動重評孔學的運動之後，吳虞從四川致信陳獨秀說：「不佞常謂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然欲堅執其學以籠罩天下後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制之餘焰，則不得不攻之者，勢也。」⑦這話確切地說明了《新青年》是被迫應戰的。《新青年》上最早發表的評孔文章之一——易白沙的〈孔子平議〉，說理相當平實，作者認為：「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孔

子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制之弊」；孔子思想被歷代君主利用而造成許多悲劇，並不是偶然的。易白沙還認為：「各家之學，也無須定尊於一人。孔子之學，只能謂為儒家一家之學，必不可稱為中國一國之學。蓋孔學與國學絕然不同，非孔學之小，實國學範圍之大也。」「以孔子統一古之文明，則老莊楊墨，管晏申韓，長沮桀溺，許行吳慮，必群起否認。」<sup>⑧</sup>態度比較激烈的是陳獨秀。他的〈吾人最後之覺悟〉<sup>⑨</sup>、〈憲法與孔教〉<sup>⑩</sup>二文指出：在民國時代，「定孔教為國教」是倒行逆施；「三綱說」為孔教之根本教義，「尊卑貴賤之所由分，即三綱之說之所由起也。此等別尊卑、明貴賤之階級制度，乃宗法社會封建時代所同然。」「吾人果欲於政治上採用共和立憲制」，必須排斥此類學說。而且，「舊教九流，儒居其一耳」，「今效漢武之術，罷黜百家，獨尊孔氏，則學術思想之專制，其湮塞人智為禍之烈，遠在政界帝王之上。」（在答常乃德的信中，陳獨秀又補充了一句：「即孔學也以獨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sup>⑪</sup>在〈復辟與尊孔〉中，陳獨秀又說：「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理之自然，無足怪者。故曰：張、康復辟，其事雖極悖逆，亦自有其一貫之理由也。」<sup>⑫</sup>他由「三綱」為儒家根本思想，得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sup>⑬</sup>的結論。

所有這些，都說明新文化運動中堅人物的評孔批孔，並不是針對孔子本身，而是針對現實中的復辟事件和「定孔教為國教」這類政治舉措的。李大釗就說得明白：「余之掙擊孔子，非掙擊孔子之本身，乃掙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掙擊

孔子，乃掙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sup>⑭</sup>當時那些批評孔子學說的文章，包括陳獨秀、易白沙、李大釗、胡適、高一涵以及稍後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等一系列論文，分寸不當或有之，卻沒有全盤否定孔子或儒家，更沒有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相反，《新青年》（初名《青年雜誌》）發刊詞〈敬告青年〉中，雖然指「忠孝節義」為「奴隸之道德」，卻規勸青年要以孔子、墨子為榜樣，樹立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吾願青年之為孔墨，而不願其為巢由」）。陳獨秀在〈再答常乃德〉的通信中談到孔子的學說：「在現代知識的評定之下，孔子有沒有價值？我敢肯定的說有。孔子的第一價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態度。……第二價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禮教。這一價值，在二千年後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而在孔子立教的當時，也有它相當的價值。……孔子不言神怪，是近於科學的。」李大釗的〈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一文說：「孔子於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聖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甚至說孔子如果活在今天，「或更創一新學說以適應今之社會，亦未可知」<sup>⑮</sup>。他們都稱歷史上的孔子為「偉人」、為「聖哲」，肯定他作出過很大貢獻，只是認為他的許多思想未必適合於現代生活而已<sup>⑯</sup>。對於儒家以外的諸子各家，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也有分析，其中墨家受到很高的評價。《新青年》第1卷第2號所載易白沙〈述墨〉一文說：「周秦諸子之學，差可益於國人而無餘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其學勇於救國，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精於制器，善於治守，以寡少之眾，保弱小之邦，雖大

新文化運動中堅人物的評孔批孔，並不是針對孔子本身，而是針對現實中的復辟事件和「定孔教為國教」這類政治舉措的。他們都稱歷史上的孔子為「偉人」、為「聖哲」，肯定他作出過很大貢獻，只是認為他的許多思想未必適合於現代生活而已。

1921年，胡適為《吳虞文錄》作序，帶點親切地開玩笑的成分說吳虞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原話並沒有個「倒」字。後人拿胡適這句戲言加上一個「倒」字，成了「打倒孔家店」，當做「五四」的口號，豈不有點可笑？

國莫能破焉。」易白沙在文化上的理想是融合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兼取二者之長：「以東方之古文明，與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結婚禮。」<sup>⑩</sup>這裏有「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意味呢！特別應該說明的是，「五四」當時並沒有「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五四」文化口號其實只有兩個：提倡「民主」，提倡「科學」，最多再加上一個「文學革命」，即使在評孔批孔最為激烈的1916年到1917年，也沒有甚麼「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那麼這種說法是怎麼出來的呢？事情只有那麼一點因由：1921年，新文化運動暫時告一段落，胡適為《吳虞文錄》作序，用了一些文學性的說法來誇獎吳虞，序的開頭說吳虞是打掃孔學灰塵的「清道夫」，末尾說吳虞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這才有了所謂「打孔家店」的說法。胡適這說法，原是一種文學形象，也帶點親切地開玩笑的成分，可以說是句戲言，不很準確（第一個評孔批孔的是易白沙，批孔最有力的是陳獨秀，吳虞是一年後才捲進來的，怎麼靠他的「隻手」呢？）而且原話並沒有個「倒」字。後人拿胡適這句戲言，加上一個「倒」字，成了「打倒孔家店」，當做「五四」的口號，豈不有點可笑？

反對儒家三綱，革新倫理道德，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做的一件大事，也是它的一大功勞。「五四」還做了另一件大事，就是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發動文學革命。這也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要把幾千年的古典文學完全否定。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裏確有那麼一句話，就是「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但只要讀讀上下文，就可以看出來，他所謂要「推倒的古典文學」，其實只是「仿古

的文學。就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用大量文字讚美傳統文學裏的優秀部分，他說：「國風多里巷猥辭，楚辭盛用土語方物，非不斐然可觀」；「魏晉以下之五言，抒情寫事，一變前代板滯堆砌之風，在當時可謂文學一大革命」；「韓柳崛起，一洗前人纖巧堆朵之習，風會所趨，乃南北朝貴族古典文學變而為宋元國民通俗文學之過渡時代」；「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sup>⑪</sup>……從《詩經》、《楚辭》、漢魏樂府、唐代詩文到元明清的戲曲小說，他都給予很高評價，只批判了六朝靡麗的文風和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後七子，這哪裏有甚麼整個打倒古典文學的傾向呢！

總之，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說成是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導致「斷裂」這種說法，在三個層面上說都是不恰當的：第一，這種說法把儒家這百家中的一家當作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第二，這種說法把「三綱」為核心的倫理道德當作了儒家學說的全盤（「五四」時主要反對儒家學說中的「三綱」）；第三，這種說法忽視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非主流的「異端」成分存在。特別到明末清初，已經形成了具有啟蒙色彩的文化，像李卓吾、馮夢龍、黃宗羲、顧炎武、顏習齋、戴震等思想家、文學家的著述，已經構成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辛亥革命時期，鄧實已經將黃宗羲等「不為帝王所喜歡」的思想稱作「真正的國粹」。「五四」除接受西方科學、民主等思潮影響外，它本身就是這種「真正的國粹」的發展，何來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與「斷裂」？！

當然，「五四」新文化人物並非沒有偏激的地方。例如對駢文、對京戲、對方塊漢字、對中國人的國民

性，都有一些不合適的看法，都有一些過甚其辭的地方。像錢玄同稱京戲為「百獸率舞」，似乎看作是一種野蠻的戲；把駢體文罵為「選學妖孽」，把桐城派末流罵為「桐城謬種」；主張方塊字要改變，走拼音的道路。陳獨秀為了改變中國人在強敵面前退縮、苟安、馴順、圓滑的品性，於是在〈今日之教育方針〉一文中引用日本福澤諭吉的話推崇「獸性」<sup>①9</sup>，他自己界說所謂「獸性」就是「意志頑狠、善鬥不屈」，「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信賴本能，不依他為活」，「順性率真，不飾偽自文」，他提倡中國人要敢於跟強敵拼爭，寧死不屈，在侵略者面前要有野性的反抗，不要有奴性的馴服，意思雖然可以理解，但「獸性」這種措詞終究不妥。

不過，這些偏激之處不久就被人們所認識。拿毛澤東來說，他在抗戰時期寫就的〈青年運動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反對黨八股〉等文章中，一方面對「五四」肯定得很高，另一方面也清醒地指出「五四」存在着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偏向：「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sup>②0</sup>似乎西方的一切都好，而中國的一切都糟，毛澤東的〈反對黨八股〉就狠狠批評了這種偏向。毛澤東在30、40年代的著作裏多次講到孔子，口氣都是尊敬和肯定的，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那篇文章裏，講得非常明確，他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sup>②1</sup>他稱孔子的學說是「一份珍貴的遺產」，可見他沒有跟着「五四」偏激方面走。

而且，偏激畢竟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方面。總體上看，「五

四」是一場由理性主導而非感情用事的運動。當時提倡民主、提倡科學、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學，介紹近代西方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等思潮，主張人權、平等、自由，這些都是服從於民族發展需要而作出的理性選擇。胡適、周作人都鼓吹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就是要將傳統的一切放到理性的審判台前重新檢驗、重新估價。在反對了儒學的綱常倫理和一味仿古的舊文學之後，他們又提倡科學方法，回過頭來整理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魯迅寫《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胡適寫《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進行古典小說考證，就是要用現代的觀點、科學的方法重新整理研究古代文化。這就證明他們是要革新傳統文化，而不是拋棄傳統文化。可以說，從「五四」起，中國思想的主潮才進入現代。「五四」是一場思想大解放的運動，是把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大大向前推進的運動。「五四」是接受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危機的呼喚而誕生的，它本身並沒有帶來危機，而是基本上成功地解決了那場危機。直到今天，我們依然享受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

## 「文革」與「五四」： 南其轅而北其轍

誠然，「五四」啟蒙和反封建思想的事業並未完成。特別是經歷了60、70年代「文革」以後，人們更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這裏必須說到「文革」、「五四」和傳統文化之間到底是怎樣一種關係。在我看來，「文革」並不像林毓生、陳來教授說的那樣是「五四」全盤反傳統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上

總體上看，「五四」是一場由理性主導而非感情用事的運動。「五四」是接受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危機的呼喚而誕生的，它本身並沒有帶來危機，而是基本上成功地解決了那場危機。

「文革」和「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的相似，實質兩者的方向完全是南轅北轍。「文革」的出現有兩個根本條件：在上面，是個人專制傾向變本加厲；在下面，是個人迷信盛行。而這二者，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

面已說過，「五四」並不全盤反傳統，而且毛澤東對「五四」的毛病也有認識，恰恰相反，「文革」是「五四」那些對立面成分的大回潮，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反對的封建專制、愚昧迷信在新歷史條件下的惡性發作。「文革」和「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的相似，從實質上看，兩者的方向完全是南轅北轍。「文革」根本不是甚麼文化運動，而是執政黨內部在錯誤思想指導下引發的一場政治動亂；它在1974年發動的批林批孔，似乎涉及文化，其實卻是為了掩蓋林彪叛逃，轉移人們視線的一場政治鬧劇。「文革」的出現有兩個根本條件：在上面，是個人專制傾向變本加厲，中共民主生活受到嚴重破壞；在下面，是個人迷信盛行，某個領袖越來越不正常地被神化。兩個方面上下結合，才會發生「文革」。而這二者，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五四」提倡民主，是為了反對封建專制；提倡科學，是為了反對愚昧迷信。「文革」和「五四」恰好是反方向的運動（撇開「破四舊」之類枝節現象不談）。「文革」的發生，說明封建思想早已嚴重侵襲到了革命隊伍內部。中國反對封建思想的鬥爭本是長期的事情，僅僅「五四」那幾年不可能一蹴而就，啟蒙必須不斷地進行。大量歷史事實證明，啟蒙並沒有（也根本不可能）因救亡而被壓倒。即使在抗日戰爭這樣的救亡高潮當中，也還有新啟蒙運動，人們也還在做着大量的啟蒙工作<sup>②</sup>。真正的問題在於：一旦封建思想侵襲到革命內部，反起來就非常困難，比一般反封建難上千百倍。因為投鼠忌器，怕傷害革命，也因為封建思想有時以革命的名義出現，用革命做護身符。延安時期丁玲發表〈三八節有感〉、〈我在

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王實味發表〈野百合花〉，就是在解放區裏反對封建思想、反對宗法觀念、反對小生產意識，然而他們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國畢竟是個小農意識猶如汪洋大海的國家，封建思想幾乎無處不在，人們對此缺少清醒認識。作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張聞天，抗戰時期很強調新文化的民主性內容，他在1940年1月5日陝甘寧邊區文化界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就提出新文化必須是「民主的，即反封建、反專制、反獨裁、反壓迫人民，……主張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與民主作風的文化」<sup>③</sup>。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就不強調新文化的民主性，他認為，新文化是大眾的，所以必然就是民主的，民主用不着特別強調。這種認識上的偏差就可能產生某種專制傾向。如果說40年代這還只是苗頭，那麼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個人專制就已發展成為巨大的、嚴重的現實危險。有幾件事情可以說說：一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發言，建議加緊制訂法律、完善法治，毛澤東一句話就頂回去：「你要知道，法律是捆住我們自己手腳的。」<sup>④</sup>可見，毛要的是無需法律、不受任何限制的那種行動自由。二是對毛的個人迷信已達到相當可觀的程度。記得1958年秋，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周揚到北京大學來做報告，就鼓吹「時代智慧集中論」，據他說，每個時代的智慧都會集中到某一方面。比方說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時代智慧集中在文學上，出現了許多偉大的作家和文學批評家；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時代智慧就集中在政治上，表現為黨中央有了毛澤東這樣英明偉大的領袖，那是國際上都少有的<sup>⑤</sup>。到

## 為了不讓「文革」悲劇重演

巴金在1979年批判「四人幫」時，曾說過這樣一段非常沉痛的話<sup>②</sup>：

「四人幫」之流販賣的那批「左」的貨色全部展覽出來，它們的確是封建專制的破爛貨，除了商標，哪裏有一點點革命的氣味！林彪、「四人幫」以及甚麼「這個人」、「那個人」用封建專制主義的全面復辟來反對並不曾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把種種「出土文物」喬裝打扮硬要人相信這是社會主義。他們為了推行他們所謂的「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不知殺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今天我帶着無法治好的內傷迎接「五四」運動的60周年，我慶幸自己逃過了那位來不及登殿的「女皇」的刀斧。但是回顧背後血迹斑斑的道路，想起11年來一個接一個倒下去的朋友、同志和陌生人，我用甚麼來安慰死者，鼓勵生者呢？說實話，我們這一代人並沒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務，也沒有完成實現民主的任務。

這段話說得非常好，既針對着「文革」，又涉及到「五四」開啟的事業，都很一針見血。它可以說代表了億萬「文革」親歷者的共同心聲。

所以，「文革」表面上是打倒一切，封資修文化全批判，實際上是封建主義大回潮和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在起作用。它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方向是相反的。為了避免「文革」的悲劇重演，我們得出的結論應該相反，不是去否定「五四」，而是應該發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理性精神，繼續進行反封建思想的鬥爭，繼續進行民主、法制建設，對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都採取實事求是的分析態

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劉少奇發言，明確提出「我們就是要搞點個人崇拜」<sup>①</sup>。如果與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明確反對個人迷信相比，可以看出，這些都是很大的轉折，埋伏着很大危險。林彪正是利用這種氛圍把個人迷信推向極端，從而實現其奪權野心的。三是經過反右派和反右傾，打倒、批臭了黨內外一批不同意見的人，也就是所謂「民主派」。在批判中並且形成一種理論：民主革命時期的老革命如果不自覺地改造，到社會主義時期就會成為反革命。「民主」於是成了非常可怕的东西。民主主義思想這樣被批臭的結果，是個人專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通行無阻。所以鄧小平同志在70年代末深有感慨地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sup>②</sup>真正說中了事情的要害。四是毛澤東1958年從第一線退下來後，用許多時間讀《資治通鑑》、「二十四史」等大量古籍，他從歷代興亡吸取經驗、智慧和策略。現實中「三面紅旗」遭遇的挫折，增強了他無端的懷疑猜忌心理。他很怕遭到斯大林死後被赫魯曉夫鞭屍的命運，很怕中國出赫魯曉夫<sup>③</sup>。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文化中那些讚美專制、排斥異端、愚弄民眾甚至扼殺人性的消極成分，恐怕未必不會對毛澤東產生作用。像《商君書·修權》所謂「權制獨斷於君則威」；《荀子·王制》所謂「才行反時者殺無赦」；《論語·泰伯》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墨子·尚同》所謂「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等等，我們難道沒有從60、70年代中國的現實中看到這類思想的投影嗎？以上這種種條件糾合在一起，「文革」的爆發幾乎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發言，建議加緊制訂法律、完善法治，毛澤東一句話就頂回去：「你要知道，法律是捆住我們自己手腳的。」可見，毛要的是無需法律、不受任何限制的那種行動自由。

度，繼承一切對人民、對民族有益的好內容，而摒棄那些反人民、反民主的有害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應該吸取的經驗教訓。

### 註釋

①②④ 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頁2：1；16-24、140。

③ 陳來：〈二十世紀文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載《東方》雜誌創刊號，1993年。

⑤ 高一涵：〈非君師主義〉，載《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

⑥ 陳獨秀：〈舊思想與國體問題〉，載《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

⑦ 吳虞此信載《新青年》，第2卷第5號「通信」欄，1917年1月。

⑧ 易白沙：〈孔子平議〉上下篇，分別載於《新青年》，第1卷第6號、第2卷第1號，1916年2月、3月。

⑨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載《新青年》，第1卷第6號，1916年2月。

⑩ 陳獨秀：〈憲法與孔教〉，載《新青年》，第2卷第3號，1916年11月。

⑪ 陳獨秀答常乃德信，載《新青年》，第2卷第6號「通信」欄，1917年2月。

⑫ 陳獨秀：〈復辟與尊孔〉，載《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

⑬ 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載《新青年》，第2卷第2號，1916年10月。

⑭⑮ 李大釗：〈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載《甲寅》日刊，1917年3月30日。

⑯ 如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文認為：「中土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是等禮法，……又焉能行於今日之中國！」見《新青年》，第2卷第4號，1916年12月。

⑰ 易白沙：〈孔子平議〉下篇，載《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3月。

⑱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載《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

⑲ 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載《新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2號，1915年10月。

⑳ 〈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833。

㉑ 同上書，頁522。

㉒ 參閱拙著：〈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收入《世紀的足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㉓ 《張聞天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252-53。

㉔ 吳冷西在「文革」期間一次群眾會上檢查自己思想時曾談到這一事實。

㉕ 筆者當時曾直接聽了這次報告，此處覆述其大意。

㉖ 筆者在1959年秋曾聽過當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關於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一系列發言的傳達。劉少奇發言中有此內容，絕無差誤。

㉗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168。

㉘ 據江青對美國女記者維特克的談話，劉少奇就因為1964年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介紹王光美「桃園經驗」的會上講了「30年代開調查會的方法不夠用了，現在必須紮根串聯」這句話，才被判定為「公然反對」毛的路線而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的。毛澤東在1966年發表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也證實了這一點。

㉙ 巴金：〈紀念五四運動六十週年〉，《隨想錄》第一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嚴家炎** 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現任北京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論文集《知春集》、《求實集》、《論現代小說與文藝思潮》、《世紀的足音》，專著《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等共十餘種。